

达尔富尔危机的和解进程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

罗建波 姜恒昆

摘要：中国的和平发展需要塑造和平、发展、合作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作为中国的重要盟友和日益重要的经贸伙伴，非洲大陆是中国全面走向世界的重要舞台，中非关系的持续发展也成为中国成就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最好证明。当前中国同苏丹关系及中国在达尔富尔危机解决中的重要作用，已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通过参与联合国和非盟在苏丹的维和行动、推动危机的政治解决进程，中国充分展示了承担大国责任的决心与能力。中国围绕达尔富尔问题所做的努力，体现了中国外交基本原则的强大生命力，也反映出中国外交与时俱进的鲜明特色。

关键词：达尔富尔危机；中国；国家形象

在中国的全球战略布局中，苏丹利益的总额和权重并不太大，但中国和苏丹的关系发展特别是达尔富尔问题的政治和解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与提升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关系到中国政治和外交原则的坚持、对国际社会的深度参与以及企业“走出去”的形象建构等。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所受到的外来疑惧、批评乃至诋毁，反映出日益崛起的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艰难与不易；而中国在这一问题上所做的外交选择及政策调适，反映出成就负责任大国所应有的外交谋划和政策把握。从中国实现大国崛起和建构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历史高度，来审视中国在达尔富尔危机解决中的角色及其对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启示，就具有重要意义。

非洲在中国国家形象塑造中的战略地位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的战略观念发生了显著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两大主题，国家重心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顺应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一历史趋势的前提下，中国逐步确立了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通过融入国际社会而非孤立于世界来寻求国家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一进程中，外部世界对中国重返国际社会的认可、接受乃至欢迎，对中国顺利实现自身发展目标、深度融入世界并扮演重要角色至关重要。构建富有魅力的国家形象已成为中国外交

的必然选择。

中国和平发展所需的国家形象至少包括三个核心内涵：一是和平形象。和平的对外形象是崛起大国迫切需要向国际社会所表达的品质，是建设良好形象的关键。因为，爱好和平的国家品质在国际社会中能够赢得最广泛的认同，而诉诸武力或强权的方式则会遭到世人的敌意甚至联合反击。历史已经证明，以武力征服他国的殖民方式已一去不复返，诉诸铁血方式以获取大国地位的方式也为世人所不容，即便是现有霸权国家也难以长期以单边主义维持其超强地位。二是发展形象。中国不仅要实现自身的发展和富强，在21世纪上半叶实现近15亿中国人的基本小康和国家现代化，而且还要积极推动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实现世界的和谐发展。经济的迅速发展及其对世界发展的应有贡献是国家提升形象魅力的重要内容，近年来中国软实力的提升主要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发展经验的认同。三是合作形象。中国在继续发展双边关系的同时，积极参与和创制区域和全球多边合作体系，承担自身应有的国际责任。和平、发展、合作是建构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基础，也是理解中国和平发展之道义责任的基本维度。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在谋求自身成长和发展的同时，须与世界和国际体系之间建立一种建设性的关系，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体系并为其提供力所能及

* 罗建波，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091）；姜恒昆，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金华 321004）。

的公共产品,从而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近年来,中国政府适时提出了走“和平发展道路”和构建“和谐世界”的战略和理念,旨在告诉世人,中国将主要基于现有国际秩序并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国家发展,在实现国家发展过程中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在中国的国家形象战略中,非洲大陆占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一方面,从中非双边的角度看,非洲拥有巨大的资源禀赋和强大的集体政治力量,是中国传统的战略盟友和重要性日益上升的经贸伙伴,它们对中国发展的认同、接受、羡慕乃至主动效仿,必然会在相当程度上有助于中国更稳定、更安全地获得经济发展所需的原材料和商品市场,有助于中国获得必要的政治和外交支持。中国之所以长期把发展同非洲国家的关系作为自身外交的基石,就在于通过双边的互助互援和惺惺相惜,共同增进双方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提升亚非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力。中非双方决定在21世纪建立“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互利共赢、文化上交流共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就是对中非过去50年友好关系的总结和提升,是对未来中非关系深入发展的规划和期待。另一方面,从国际多边维度看,中非关系的持续发展及对非洲良好形象的建立也能有效回应部分西方人士对中国崛起的种种担忧和诋毁,有效展示中国诉诸和平发展的战略意图,从而改变和优化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处境。在中国成长为世界大国的进程中,非洲大陆是中国拓展国际影响力、树立自身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舞台,中国在非洲的政治姿态将向世人展示一个崛起的东方大国应有的政治风度和全球责任。所以,在非洲塑造更为良好的国家形象无疑将使中国进一步获得成就世界大国所必需的硬实力和软实力资源。因此,从国家和平发展和中非关系的大局出发,从对世界有所贡献的高度来审视中国在非洲的软实力外交与国家形象塑造,就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达尔富尔危机与中国国家形象的“关联”

近年来,苏丹达尔富尔危机成为中国塑造在非

洲良好形象的重大挑战。究其实质,达尔富尔问题是苏丹内部的治理危机和发展危机,其根源为当地阿拉伯人与黑人之间的资源冲突,以及解决这一冲突的传统协调机制的崩溃。而美国等部分西方国家多用意识形态的眼光来关注和理解苏丹的问题,将达尔富尔冲突的性质与内容更多地加以某种夸张或曲解。它们指责苏丹政府是独裁政权,认定政府军实施了对黑人种族的隐蔽性种族清洗或大屠杀。美国政府于2004年4月强势介入达尔富尔问题,美国国会于7月将达尔富尔地区冲突界定为“种族大屠杀”,这一界定在同年9月得到美国调查团的正式认定。^①美国政府还多次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制裁苏丹的议案,但由于安理会理事国之间的严重分歧而未能通过。正是在美国的“卖力”推动下,这一原属非洲国家内部的冲突被迅速国际化了。

达尔富尔危机的国际化从一开始就是与部分西方国家对所谓“中国力量”和“中国因素”的刻意渲染同步进行的。在中国日益崛起的今天,中国的外交举措及其发展走向一直备受世人关注。凡重大国际政治经济问题或地区危机事件一旦牵涉“中国因素”,都必然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并迅速成为那些敌视中国的媒体和组织的“炒作”对象。自从中国与苏丹建立起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特别是中国在苏丹的石油合作开采中扮演重要角色之后,国际上一些对中国抱有成见的组织和个人开始蓄意将达富尔冲突这一非洲国家的内部问题与中国外交联系起来,对中国相关外交政策和中国与苏丹关系的发展进行了不严谨、不真实,甚至是刻意歪曲丑化的解读和报道。由于西方国家主导着国际舆论的话语权,这些言论的国际传播给中国国家形象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影响。

一是能源合作的“泛政治化”及其影响。中国同苏丹的经贸与能源合作是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互利合作,是中国和苏丹双方基于各自国家利益和优势互补基础上的理性选择。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大量的原材料和商品市场,而苏丹作为一个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特别是产业升级和产品多样化也需要外部的资金和技术。中苏经贸合作不仅是互利的,也是透明的、不排他的,包括中国、法国、加拿大、印度和马来西亚等国

^① 在美国调查团得出达尔富尔冲突是种族大屠杀的结论后,联合国就此问题专门派出调查小组即“达尔富尔问题国际调查委员会”前往当地调查,该调查委员会于2005年1月提交的报告认为苏丹政府并未在达尔富尔推行种族屠杀政策。参见 UN,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Inquiry on Darfur to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y General, 25 January, 2005.

的能源企业都参与了苏丹能源的投资与开发。然而,部分西方国家无理指责中国发展同苏丹友好关系就是与苏丹专制独裁或有恐怖主义倾向的政权为盟,开发和购买苏丹石油就是纵容甚至支持苏丹政府对达尔富尔黑人种族的镇压。一些人甚至把矛头指向整个中非关系,他们宣称中国对苏丹等非洲国家的资源开发是“新殖民主义”式的掠夺,中国对非洲贸易是典型的“新重商主义”;中国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经济援助忽视了非洲国家的民主和人权状况,客观上支持了非洲的所谓“失败国家”或“流氓国家”,破坏了非洲国家致力于民主改革和追求良治的努力。^①部分非洲人士由于并不了解中国的外交政策,或深受西方教育且与西方社会有着各种利益联系,也借机鼓噪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使中国在非洲的形象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二是人权与主权领域的立场之争。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中国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有别于西方国家,双方在“人权”问题上长期存在严重的对立和斗争。中国在人权问题上所受到的指责及应对,一直是关乎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议题。中国同部分西方国家在“主权”问题上也有观念分歧,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联合国人道主义干预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但反对某些西方大国依仗强大政治经济实力而提出的“主权过时论”和“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在后冷战时代,以意识形态胜利者自居的发达国家坚持冷战思维,动辄以人权为由对那些奉行不同价值观念和发展模式的国家进行打压,其主要手段是推动“人权国际化”和联合国的“人权中心化”,将人道主义干预思想渗透到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与制裁行动之中。在达尔富尔问题上,中国一贯坚持在尊重苏丹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通过对话与平等协商政治解决达尔富尔问题,反对动用经济制裁手段和单方面的武装干预。而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基于先入为主的判断,在政治上谴责苏丹政府的“种族灭绝”,推动国际社会全面孤立和制裁苏丹政权。基于这样的政治分歧,一些西方媒

体和国际组织对中国反对安理会就达尔富尔问题制裁苏丹横加指责,批评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将他们与中国的人权分歧扩大到苏丹问题上。近期,少数西方政客和非政府组织,甚至美国国会众议院竟以抵制2008年北京奥运会要挟中国向苏丹政府施加压力。

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之所以对中国对苏丹的外交政策大加批评,主要原因有:其一,虽然冷战早已结束,但部分西方人士仍习惯用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中国所做的一切,将中国不同于西方的外交政策意识形态化。其二,西方国家觊觎苏丹重要的地缘政治和经济价值。当前美国在非洲的反恐重心位于非洲之角和撒哈拉中西部地区,苏丹是联结上述两地的重要纽带。苏丹北部伊斯兰势力执掌中央政权及该政权在其早期阶段表现出的某种“伊斯兰主义”倾向,它与某些伊斯兰极端势力似乎有过的紧密联系,使得这一政权与西方国家之间出现了复杂的关系。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基地”组织曾以苏丹为基地策划过多起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事件,更使美国担心苏丹局势的失控将引发伊斯兰极端恐怖势力在非洲的大规模扩散。苏丹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推动达尔富尔问题的国际化并借此改变苏丹国内政治格局,是重新获取该地区石油资源的重要契机。非洲是西方国家的传统势力范围,在苏丹建立亲西方政权,将其纳入西方国家的战略轨道,无疑是西方国家的重要战略目标。近年来西方国家加大了重返非洲的力度,巩固并加强主导非洲事务的意图进一步增强,美国甚至建立了“非洲司令部”。“中国力量”和“中国因素”在非洲的快速增长无疑刺激了西方国家的敏感神经。其三,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并不十分了解。近年来中国经济体量和规模的扩张及其投向势必引起国际社会的正常关切,而达尔富尔问题的异常复杂又加剧了他们对中国的疑惧和担忧。因此及时向国际社会宣传中国的外交政策和举措,坦言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立场、态度和努力,

^① See Denis M. Tull, "China's Engagement in Africa: Scope, Significance and Consequences",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September 2006, pp.459- 479; Joshua Eisenman and Joshua Kurlantzick, "China's Africa Strategy", *Current History*, May 2006, pp.219- 224; Michael Klare and Daniel Volman, "America, China and the Scramble for Africa's Oil",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Vol. 33, No.108, 2006, pp.297- 309; The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More than Humanitarianism: A Strategic U. S. Approach Toward Africa", *Independent Task Force Report 56*, 2006, pp. 40- 54; Ali Askouri, "China's Investment in Sudan: Displacing Villages and Destroying Communities", in Firoze Manji and Stephen Marks, eds., *African Perspectives on China in Africa*, Cape Town: Fahamu- Networks for Social Justice, 2007, <http://www.fahamu.org/pzbook.php>.

无论对于回击“中国威胁论”，还是回应国际社会的善意关切，都显得尤为迫切。

中国参与达尔富尔危机 和解进程与国家形象的维护与提升

自达尔富尔危机国际化以来，国际社会就如何解决危机存在严重分歧和对立，世界各主要大国围绕此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权益博弈和力量角逐。美国要求全面制裁苏丹的政策和举措并未得到联合国的认可，也遭到了苏丹政府和非盟、阿盟的反对，美国的传统盟友欧盟国家也并未步美国后尘。从达尔富尔问题产生的根源和矛盾的症结看，制裁和孤立苏丹现政权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造成更严重的对立。中国关于政治解决危机的主张与联合国、非盟的原则是基本一致的，并且已经成为当前危机解决的主导形式。因此，达尔富尔问题在给中国外交提出挑战的同时，也为中国显示自身外交原则的强大生命力，展示自身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影响力，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契机。

(一) 支持和参与维和行动，展示中国承担大国责任的决心和能力。

冷战结束以来，国内冲突和战乱成为非洲政治不稳定的主要表现形式。这些冲突多牵涉复杂的种族和宗教矛盾，往往导致大规模的国家失能和人道主义灾难。自2003年2月达尔富尔危机爆发以来，共有20多万人直接或间接死于武装冲突，至少200多万人无家可归。^①联合国早在2004年就将此危机确定为“世界上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适度动用国际和区域集体安全机制以制止危机升级、保护难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成为稳定苏丹局势并寻求政治和解的先决条件，也是国际社会对联合国、非盟的期待。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从苏丹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区域政治稳定的角度出发，主张在尊重苏丹政府的基础上适度开展国际干预。

一是支持非盟在苏丹的自主维和行动。非盟于2004年开始在达尔富尔地区执行维和使命，此后不断加大对冲突的干预力度，维和人数逐步增加到7000人，是非盟成立以来对一成员国内战实施的最大规模的武装干预。^②中国积极支持非盟在解决苏丹危机中的主导作用，向非盟维和行动捐款180万美元。但由于非盟维和部队受人数、装备和财力的限制，维和效果并不理想。

二是支持并参与联合国在苏丹的维和使命。早在2005年5月中国就积极响应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建立联合国苏丹特派团(UNMIS)的第1590号决议，向苏丹派出第一批435人的维和部队。这是继向柬埔寨、刚果(金)、利比里亚和黎巴嫩派遣维和部队之后，中国第五次成建制派遣部队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中国积极敦促苏丹政府接受安南于2006年11月提出的分三阶段维和的方案。在苏丹政府原则接受该方案的前提下，中国又推动联合国安理会于2007年7月31日一致通过了向达尔富尔地区派遣大约2.6万人的联合国和非盟混合维和部队的第1769号决议，并率先在2007年10月上旬向达尔富尔地区派遣为部署混合维和部队做准备的315人工兵分队，该分队也是联合国在此次混合维和行动中派出的第一支部队。几年来，在苏丹执行维和任务的中国维和部队以出色的表现，充分展示了中国军队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和平之师的良好形象。联合国苏丹特派团高度赞赏中国维和部队的贡献，并于2007年9月分别授予中国维和部队工兵分队、运输分队和医疗分队“集体特殊贡献奖”，同时向22名中国维和人员颁发“个人特殊贡献奖”。^③

(二) 推动危机的政治和解进程，提升在解决重大地区危机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

维和固然重要，但是政治和解才是维和的最终目的。自达尔富尔问题出现以来，中国一直扮演着劝和促谈的角色，积极支持非盟和阿盟在区域框架内寻求能被各方接受的政治解决办法。2007年2月2日，胡锦涛主席在中非论坛北京峰会后的首次非洲

① 详见联合国中文网站苏丹达尔富尔网页：<http://www.un.org/chinese/ha/issue/sudan/un.shtml>。

② See ICG Africa Briefing No. 28 (‘The AU’s Mission in Darfur: Bridging the Gap’, Nairobi/Brussels, 6 July 2005) and No. 43 (‘Getting the UN into Darfur’, Nairobi/Brussels, 12 October 2006)。

③ 中国驻苏丹大使馆：《中国驻苏丹大使李成文出席驻苏丹维和部队“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2007-09-17，<http://www.fmprc.gov.cn/chn/wjlb/zwjg/zwbdt/zybd/t363101.htm>。

之行中访问了苏丹,提出处理达尔富尔问题应遵循的四项原则:(1)尊重苏丹主权和领土完整;(2)坚持对话和平等协商;(3)非盟、联合国等应该在达尔富尔维和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4)促进地区局部稳定。^①中国政府先后向达尔富尔地区派遣了5个了解实地情况的特使团,2007年5月10日更是首次任命了以达尔富尔问题为近期工作重点的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在各方的努力下,苏丹达尔富尔问题国际会议于2007年7月15日至16日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举行,会议的重要成果是重启达尔富尔和平谈判和政治进程的时间表,确立非盟、联合国和周边国家为政治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主渠道,宣布相关“路线图”进入谈判准备阶段。应该说,达尔富尔问题能走上政治解决的轨道,与中国的斡旋与协调有着重要关系。

当前,国际社会已普遍认可“双轨”战略,即平衡推进维和行动和政治进程:一方面要尽早向达尔富尔地区派遣混合维和部队,另一方面还要积极推进达尔富尔地区的政治和解进程,敦促未签署《达尔富尔和平协议》的派别尽早签署该协议。为此,中国一方面鼓励和推动苏丹政府保持与国际社会的对话与合作,坚持安南方案的大方向;另一方面,呼吁和敦促有关各方把苏丹视为解决问题的当事方,与其进行平等对话与合作。苏丹政府欢迎政治解决达尔富尔问题,迄今已颁布涉及财富和权力分配等内容的200余项总统令,以恢复当地的行政和法律秩序。

(三)对苏丹提供发展援助并开展互利合作,从根本上推动达尔富尔危机的解决和苏丹的稳定与发展。

达尔富尔问题的根源是贫困和落后,只有通过经济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如果不承认其资源短缺并合理分享这一生态脆弱地区的自然资源,不能恢复该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任何和平努力最终都将归于无效。因此,国际社会除继续向达尔富尔地区提供人道援助外,还应该提供资金、技术等发展援助,使经济复兴与政治和解平衡推进。在经济复兴的基础上实现各族间的真正宽容和共处,才是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根本出路,也是那些忙于“灭

火”的国际组织、西方强国以及苏丹政府真正应该考虑与解决的问题。

由于意识到达尔富尔问题的实质是发展问题,中国除向苏丹政府提供了8000万元人民币的人道主义物资援助外,还把苏丹经济发展和达尔富尔地区的经济重建作为处理达尔富尔问题的关键。正是中国石油集团在苏丹投资创业的成功,使苏丹由一个纯粹的石油进口国变成了石油出口国,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建立了上下游一体化、技术先进、规模配套的石油工业体系。苏丹石油项目全部投产后,每年可增加苏丹国内生产总值约17亿美元。不仅如此,中国石油企业还积极关注当地民生,为当地援建医院,修建桥梁、机场以及道路等基础设施,改善当地群众的生活条件。截至2006年底,中国石油集团累计投资苏丹公益事业3228万美元,受益人数超过150万人。^②通过经贸合作和发展援助推动达尔富尔问题的彻底解决,是当前中国外交的特色和亮点所在。

关于中国外交政策调适 与国家形象优化的几点思考

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所做的外交选择和政策调适给崛起进程中的中国外交以深刻的启示。作为一个日益融入国际社会的国家,中国如何维护和提升自身的国家形象;作为一个认识到自身利益和责任的经济大国,在与相关国家交往时该怎样确定自己的角色内容;作为一个综合国力还比较有限的新兴大国,如何在新的斗争舞台上进行外交工具的选择和“软实力”的建构等,都是当前中国外交必须正视并解决的迫切问题。

(一)继续坚持并发展“不干涉内政”原则。“主权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是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今后仍不会改变。这一原则有效维护了中非友好关系的巩固和发展,成为中国对非洲外交不同于西方国家对非洲政策的最大区别之一。中国反对西方大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对苏丹采取单方面的军事和经济制裁,主张以政治和解为主并充分尊重和考虑苏丹政府的关切,就是对“不干涉内政”原则的

^① 《胡锦涛同苏丹总统巴希尔会谈》,《人民日报》2007年2月3日,第1版。

^② 《薄熙来:中国石油在非洲石油投资上所做贡献有目共睹》,2006-11-06, <http://news.cinews.com.cn/system/2006/11/06/001025164.shtml>。

坚持。在达尔富尔危机的解决进程中,中国固然需要坚持原则以维护自身一贯的外交立场,同时也需灵活运用外交手段以应对情势发展的需要,同时兼顾中国海外利益、中国同苏丹关系、中国同国际社会的良性互动等多层面的复杂关系。中国通过多种途径劝和促谈,以弃权票的方式表达了自身对联合国第1556、1564号决议的立场,就是综合平衡各方权益后所做出的外交选择。“弃权”并不必然不利于中国的大国形象塑造,它表明中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既坚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和原则性,又避免了与世界主要大国的直接冲突。不仅如此,中国还积极参与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在苏丹的维和使命,表明中国对合法集体干预的接受与认同,并愿意在国际多边行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达尔富尔问题上,中国政府的举动显然是在一定范围内对“不干涉内政”原则的灵活性有所发展。

(二) 适时适度地承担“全球责任”。在中国日益崛起的今天,中国外交应当具有更为广阔的全球视野,不仅关注自身的经济发展,也应关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秩序的建构和承担更多的全球责任,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必需的公共产品。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快速发展并日益融入国际社会的大国,这样的身份使中国既是当前南南合作的倡导者、推动者,同时也是南北合作的积极呼吁者和参与者,成为连接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的“桥梁”。当前的非洲大陆仍是世界上最不发达和最为动荡的地区,非洲国家也正在通过一体化寻求非洲复兴。中国应在自身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对非洲国家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支持,实现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做到“量力而行”和“尽力而为”的有效统一。通过与非洲国家的合作来带动中非双方的互利发展与共同繁荣,已成为中国彰显自身崛起于世界是机会而决非威胁的生动例证。具体到苏丹,中国在确保苏丹免遭西方经济制裁的同时,应鼓励中方投资企业更多地支持当地的社会治理与发展,增加对达尔富尔危机的人道援助及对联合国和非盟在苏丹维和行动的经济支持,关注国际社会对苏丹政府的其他指责、要求或期望,这些都能真正体现出中国的大国责任。未来中国外交的转型方向无疑应是更为进取的、开放的和包容的,在调整传统国家主权范式、适应全球化需要的同时,要深度参与国际社会的有关活动,有选择地

满足国际社会对全球公共产品的需求,并在这一进程中有效地保护自身利益。中国政府在新时期适时提出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就体现了日益崛起的中国对世界秩序以及中国自身角色的战略考虑。

(三) 注重对外政策的国际宣传。西方社会对中国在苏丹问题上所做的批评,部分源于他们对中国外交政策的不了解和固有的意识形态偏见。因此,需要加大对外政策的宣传力度,有针对性地做好增信释疑的工作。在国际政治较量中,不能忽视或轻视西方社会对中国非洲政策的指责,因为就某种意义上而言,西方国家在当今世界所拥有的话语权必然会增加中国建构软实力的代价和难度,给本来良性发展的中非关系带来不应有的变数。所以,完善和优化国家形象离不开适时的形象战略和精致的国际宣传策略,中国必须重视在技术层面宣传自己的对非洲政策,“只做不说”或者“多做少说”在信息化时代已越来越不适应国际政治舞台和外交领域的现实需要。一方面,中国应大力宣传自身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支持。就非洲而言,中国在历史上曾长期支持非洲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发展经济的努力,双方由此建立了深厚的传统友谊;当前中非关系是建立在平等协商和互利共赢基础上的伙伴关系,中国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采取所谓的“新殖民主义”政策。另一方面,中国也需要向西方国家说明,虽然彼此在非洲存在一定的竞争,但中国无意将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挤出非洲市场;中国积极与非洲各国打交道,主要是出于自身经济增长和中非关系持续发展的需要。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大国不仅可以就非洲的人道主义危机(如苏丹达尔富尔问题)展开实质性对话,而且还可以就更为广泛的能源和资源开发问题进行协调。这种合作不仅有利于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利益,对非洲的和平与发展也有裨益。

(四) 注重与国际社会开展民主与人权领域的对话。从客观上看,中国所选择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从来就没有为西方所接受和认同,在苏东剧变后仍然是部分西方国家诋毁、攻击的一个主要对象。部分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实力及其对国际话语权的垄断,使它们对中国的负面评价能广泛触及世界的每个角落,从而严重损害中国的国家形象。可以预见,在短期内试图彻底消解中西方在意识形态认

同上的差异实非易事,但通过定期和多层面的沟通与对话以增进各方的互相理解,从而不对双方的总体外交造成负面影响,仍是可能的。

中国应及时向国际社会阐明:其一,实现民主、自由和平等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具有不容置疑的普世性。当前中国人民也正在致力于追求政治民主和社会进步。但民主和自由的具体实现方式和表现形态又因各个国家的社会历史发展、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观念等方面的不同而不同,而表现出民主政体的多样化。在当前全球化和多元化的时代,即便是拥有几百年民主传统的西方民主国家相互之间在具体的制度形式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中国与其他国家在政治与价值观的认同方面出现一定的差异实属正常。其二,中国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的意愿。过去中国强调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当前中国倡导多元共存与世界和谐,其实质都是主张国际社会的多元化和多样化,主张不同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都应当和谐相处,认为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才是通向未来和谐世界的必由之路。在加强对话的同时,从长远来看,中国还须加大国内政治改革的步伐,增强自身在“民主”、“公正”、“平等”、“正义”等价值取向上的普世性,以此获得世界的认同。这就涉及如何在坚持个性特质的同时认同和践行共同价值观的问题,是中国构建国家形象的关键问题之一。

(五) 建立国际危机事件的形象维护机制。重大国际突发事件和危机容易在短时期内急剧损害国家形象,苏丹达尔富尔危机的国际化及国际社会对中国外交政策所做的误解和歪曲,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声誉。在建立和完善国家危机管理机制的过程中,应把维护国家形象的问题纳入国家战略的通盘考虑之中。这里主要涉及:在危机时期和危机地区如何权衡和取舍自身利益,特别是明确国家利益的主次及相关海外权益的权重;如何开展与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有效对话和沟通,建立双

边或多边的危机处理机制;如何充分调动国内涉外媒体的力量并有效影响国际舆论,使中国的声音能在国际上得到应有表达。当前中国在苏丹达尔富尔和解进程中的外交作为符合中国自身利益和中非关系发展的大局,也逐步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同,但危机事件的整个过程也给我们以深刻启示:中国外交应更具有前瞻性和应对危机的能力,掌握更多国际政治的话语权,避免导致“外界攻击—中国回应”的反射式被动局面。

(六) 建立成熟的公共外交战略和机制。国际社会对中国在苏丹问题上所做的负面报道,主要源于西方媒体、学者和国际非政府组织。部分非洲人士特别是非洲本地非政府组织由于深受西方舆论的影响,在价值观念上认同西方文化,或者缺乏对中国外交的了解,从而跟随西方舆论对中国外交做出负面评价。中国的公共外交还远未深入到西方和非洲国家的公民社会中去,还未能深入接触到拥有较大舆论影响力的国际和非洲的非政府组织。因此,需要全面总结中国民间外交长期积累的丰富经验,加快制定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战略。重点做好国外公民社会组织的工作,尤其以国外社会精英、重要智库、学术机构、公共舆论、非政府组织等为主要工作对象。可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模式,考虑设立文化交流与学术交流基金,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请进来、走出去,培养一批海外知华、友华精英队伍。同时增进与国外非政府组织的接触,鼓励中国非政府组织与国外非政府组织建立广泛联系。例如,中国政府已开始注重与非洲公民社会和舆论界人士接触,向他们展示中非经贸合作的成果。在2006年于上海举办的非洲发展银行理事会年会上,中国邀请了部分国际和非洲的非政府组织代表与会,并就中国对非投资和援助问题展开讨论。在今后几年内,中国应紧紧抓住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强烈吸引世界眼球带来的重大契机,通过多种形式宣传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

(责任编辑:李 丹)

Foreign Strategies Comparison and Sino- Indian Relations (37)

LAN Jian-xue

India 's foreign policies and strategies are getting more and more pragmatic and economy- oriented, and leaning towards the Western developed powers in the Post- Cold War era. Foreign policies of both India and China strive to cultivate a favorable environment for respective rejuvenation and improve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orders dominated by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In the coming future, Sino- Indian relationship will enter a crucial phase where both sides have to tackle thorny issues such as the long- lasting border disputes and strategic distrust in the context of simultaneous rise. Harmonizing interests of both sides, institutionalizing cooperation, and seeking common ground while reserving differences will be significant for updating Sino- Indian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Settlement of Darfur Crisis and the Build- up of China 's National Image(44)

LUO Jian-bo, JIANG Heng-kun

China needs to build a national image of peace,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nd responsibility for its peaceful development. As a significant friend and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rade partner of China, Africa is a stage from which China advances to the world in an all- round way.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ino- African relationship best illustrates that China is a responsible country. At present,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is paying great attention to China 's relations with the Sudan and China 's role in solving the Darfur Crisis. China is engaged in the peacekeeping activities of UN and AU in Darfur and committed to promoting a political settlement of the crisis, which clearly manifests China 's determination and ability to shoulder responsibility as a big power. The efforts made by China to solve the Darfur Crisis indicate the strong vitality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China 's foreign policy as well as its special feature of advancing with times.

Securitizati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Dynamic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Norms(51)

PAN Ya-ling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and acceleration of global power transition, global governance and relevant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international norms have become the focuses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t is worthwhile to further discuss on how to facilitat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bring about dynamic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norms through securitizat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o achieve the success of securitization, two conditions are indispensable. The first is to describe logically the threat- agent as "existential threat" from cause and effect, temporal, and moral dimensions; the second is the recognition by the audience of the securitization rhetoric through the lens of focus events and the mass media. With international society as its referent objective and non- state actor as its threat- agent, it will be easier for a successful securitization to bring abou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dynamic,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norms. However, this also contains a big risk of securitization of the other. As a participant, constructor, and maintainer of international system, China will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the building of international norms more actively.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this process, however, is how to take the initiatives when China takes part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in the creation, maintenance, and/or revision of international norms. This study will provide some points for thought in this respect.

Globalization and State Autonomy: The End of State 's Missions?(60)

XIONG Wei

The tension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national policy autonomy is one of the core subjects in the globalization debates. This